

66 书人书事

纪录云南报业发展足迹

——《云南省志·报业志》编纂记

李成生

—

己亥年初,受集团委派,我参与编纂《云南省志·报业志》(以下称《报业志》),这是归田之前为集团和全省报人做的最后一件事,觉得非常有意

义,做了大半辈子报人,画这样一个圆满的句号,倍感荣光。但是,这份荣誉的得来,充满预想不到的艰辛:日无暇晷,胼手胝足,纂成之日,白发又添。可谓费尽移山心力,三个月拿出70余万字的初稿,我和同仁搞得灰头土脸,憔悴不堪。这种超常规编纂史志,戏称“三边工程”: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

《报业志》是一部断代史,主要记录改革开放40年来云南省报业发展的轨迹,时间上启1978年,下止2005年。编纂之初,手头仅有前辈编写的两本《云南日报》发展资料,其余各报资料为零。幸得省委宣传部、省志办鼎力支持,发文号召全省各级报纸成立编纂班子,指定专人负责此事,倾力配合,克期完成。粗略统计,全省各报参加“会战”同仁超过120人,仅云报集团就出动“兵力”70余人。按照史志编写的规则和惯例,修志先要有一个基本能定下来的篇目,再根据这个篇目做资料长编,根据长编要点分配编纂人员任务,撰编志书各章节,最后由主纂统一风格成书,称“众人修志,一手成书”。可是《报业志》的编纂已经无法按这个常规进行,要把三年才能完成的事压缩到三个月内,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己亥三月中旬接到任务,一脸茫然。2月25日,省委宣传部批转报业集团《云南省〈报业志(1978—2005)〉编纂方案》只有这些内容:指导思想、组织机构、编写要求、编纂步骤、编纂任务分工、工作要求六个部分,内容分为新闻事业编、概述和大事记、报业经营改革与发展编、报界人物传略(附录)四个部分,没有篇目。做出一个篇目成为当务之急,篇目是纲领,没有纲领就无所适从。困难逼出人们的聪明才智,编纂小组首先想到的是现代网络系统:迅速建一个联系全省各报有关人员的微信群,开通一个专门工作邮箱,派出编辑到档案馆辑录所需史料,而经过多年努力建成的云报集团数据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让编纂同仁随时查阅1950年3月4日至今的所有《云南日报》电子版面,并下载所需资料,使短期完成志书编纂成为可能。

海量的素材每日不停地传到专门邮箱中,同仁们为了让我最早读到有用信息,直接把资料发到我的微信上,从早晨6点到深夜2点,我的手机微信一直响个不停。我的任务就是读完这些资料,然后分门别类做一个档案,很快,这些档案文件夹就超过百万字。整个4月,每日早晨6点半起床,凌晨两点睡觉,把这些枯燥的文字一—整理,按照志书“横排门类,纵述史实;事以类从,类为一志;述而不论”的基本原则,做出了一个较为详细的篇目,并与同仁一起投入艰苦紧张的章节编撰。这个篇目经过5次修订,直到5月初才基本定下来,这个时

候,同仁们基本完成了各章节的撰写,我在完成自己分撰任务的同时,细读同仁们的稿件,并不断以微信形式撰写了20多篇修改建议,与同仁切磋良方。《史记·淮阴侯列传》里有一句话:“骐骥之踴躍,不如弩马之安步”,生性愚钝的我,没有贤才们敏捷的思维能力,唯一可用的伎俩就是用加倍的时间和汗水去接近最终目标。

二

始终与党同心、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行的云南报业,在改革开放40年时间里,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各报大力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忠实记录云岭大地跨越奋进的足迹,生动展现红土高原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热情讴歌各族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在改革的大潮中,报业自身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要把这些丰富的内容编纂成一部信史,殊非易事,考验着各位编纂者的政治修养、学识水平、归纳高度、担当精神。全志最后分为七个主章节、概述、大事记、附录10个部分,主体部分依次为:各级党报、各类报纸、新闻报道、副刊及摄影新闻、管理与改革、机构与队伍、新闻社团、录入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大地上创办的200多家报纸办报历程,其中重点记录了《云南日报》《昆明日报》等17张党报的办报史,记录了《春城晚报》《都市时报》等都市类报纸的创刊与发展,录入新华社等中央驻滇新闻机构在云南开展的新闻宣传工作,力图实现记录的全面、权威、可信,为后人留下一部有价值的志书。

新闻工作是一份记录历史的职业,编纂《报业志》使我充分认识到,每位记者编辑都是时代的史官,他们在琐碎的采写中为历史存照,记录历史前行的每一个足印,40年回首,我不认为新闻是“易碎品”,而是历史的笔记,有了报纸白纸黑字的记录,每一个历史片段都显得异常清晰,全省报人在参与历史中,也创造了属于时代的历史。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百废待兴,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也不例外。云南各级党报记录了这一时期的变革与阵痛:厘清文革十年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循序推进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进国有企业改制,为方兴未艾的乡镇企业鼓劲,开设栏目深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每一篇文章都充满历史的厚重感。上世纪80、90年代,都市类报纸步入全盛时期,以《春城晚报》为代表的都市类、行业类报纸纷纷创刊,云南报业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都市类报纸在这一时期先声夺人,活力四射,此类报纸确立了引导舆论、传播知识、影响风尚、服务读者的宗旨,贴近现实,关注民生,针砭时弊,深得读者喜爱。在昆明,每日看《春城晚报》成为市民的生活习惯。新世纪到来前后,云南报业勇立潮头,聚焦重大活动、重大事件报道;深度报道典型事件、典型人物;关注重大灾害等突发

性事件;强化重大民生、舆论监督报道,取得了骄人成就,得到党和政府、广大读者的肯定。

不断推进改革,使云南报业获得长足发展。紧跟时代步伐,改进语境语态,持续落实新闻报道“走、转、改”方针,不断改革版面语言,保持了报纸较高的发行量。变革中报纸自身实现“涅槃”:三次技术革命报纸实现淘汰“铅与火”、告别“纸与笔”、拥抱互联网的的历史跨越。1988年5月1日,《云南日报》采用胶印出版首期彩印报纸;1989年12月26日,《云南日报》4个版已全部采用激光照排,结束了铅字排版的历史。1999年4月1日,云南日报社新闻采编网络管理系统全面开通,《云南日报》全部进入网络系统,出版了第一张由网络系统运作的报纸。随后,全省各报纷纷步入网络时代。

三

我们承担的是历史责任,需要大量优秀的报业精英推动改革。人才旺,事业兴。40年来,全省各报采取多种形式,培养报业新人,采编、经营、技术开发,各方面都拥有了一批成熟的人才,促进了报业的全方位发展。1978年以后,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从业人员队伍逐渐恢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新闻媒体数量迅速增长,从业人员数量快速增长,达到15000名。从业人员受教育层次有了显著提高,中青年骨干从业人员学历基本都在本科以上,多数具备初级、中级、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云南省把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列为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在抓好新闻单位和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和职业道德修养的多次大活动中,党委宣传部积极主导,省新闻工作者队伍在新闻事业健康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央、云南省新闻人才培养规划的指引下,20多年来基本形成了一套新闻人才在岗培训和继续教育的长效机制,各级宣传部门、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行业协会和各新闻单位大规模地组织开展了在岗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工作,大幅度提高从业人员基本素质,初步形成了基本覆盖全行业的多形式、多层次的继续教育培训体系。

《报业志》对云南省报纸发展的全方位记录,体现出较高的史料参考价值。据《旧唐书·魏徵传》记载,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直言敢谏的魏征病死。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我们编纂史志,就是为后人提供借鉴。赫尔巴特说:“历史应是人类的教师。”恩格斯也说:“我们根本没想过去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这就是我们编纂《报业志》的初衷和意义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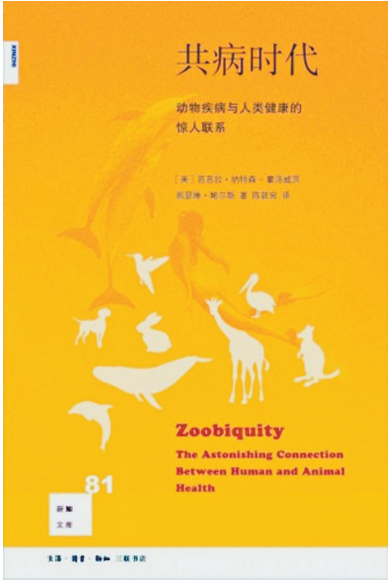
由于我们不是编修志书的专业人员,加之时间有限,疏漏是存在的,诚望方家批评指教,以便续修新志借鉴。

郭华悦

阅读笔记

与自然在共同环境中和谐共处

——读《共病时代》



《共病时代》封面

《共病时代:动物疾病与人类健康的惊人联系》(【美】芭芭拉·纳特森-霍格威茨、凯瑟琳·鲍尔斯著,陈筱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9月版)这本书,写的是美国一个真实故事。

在一种叫西罗尼的全新病毒出现之前,麦克纳马拉还只是个普通兽

医。故事的转折点,源于纽约一家野生动物园所出现的鸟类离奇死亡。后来,美国派出一组疾控中心人员前往调查。结论是:这是一起由蚊子传播引起的圣路易斯脑炎。

伴随这个结论的,是纽约市所掀起的一股灭蚊风潮。被蚊子所叮咬的人或动物,都有患上这种疾病的危险。但身为兽医的麦克纳马拉却认为,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虽然,随着调查的深入,疾控中心的结论被认定是错误的。真正引起这场疫病的,是一种从未出现过的被命名为西罗尼的病毒。这种病毒,导致了美国几万人被感染,上千人死亡。

这本书的作者,在事后采访了作为兽医和病理学家的麦克纳马拉并写下了这本书。表面上看,这事件随着真相的大白,似乎渐渐落幕了。但

其实,疫病只是开始,随后的一系列事件才是这次疫病真正的结果。

真正的结果,就是人们开始意识到,疫病并不仅仅是疫病本身,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人与动物的关系,等待着人们去关注。比如,为什么有些病毒存在于动物身上,对动物无害,但却对人类构成致命的威胁?还有,同样受到病毒感染,有些人或动物会出现症状,会死亡,但为什么另一些却没有症状?种种疑问,都等待着人们去探索。

新书推荐

杨升庵的B面与历史的疼痛

——《青山夕阳》推荐

温星

活跃于当代文坛的聂作平,以诗歌出道,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历史领域,成为浸淫历史随笔或曰“大历史文化散文”最早的作家之一。其代表作《历史的B面》《1644:帝国的疼痛》,我认为皆能进入该领域最富有个人风格与代表性的作品行列。

《青山夕阳:大明文宗杨升庵》(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版)是聂作平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由历史随笔写作进入长篇历史小说,这是水到渠成,也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毕竟,在文学的各类体裁中,空间最大、也最考验作家施展腾挪综合写作能力的,是长篇小说。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府新都县(今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在自庄踯开滇以来的云南的历史尤其文化发展史上,他绝对是一座里程碑。嘉靖三年(1524年),名满天下的状元公杨升庵与当时居首辅高位的父亲杨廷和一道,卷入“大礼议”事件,整个家族命运由此急转直下。他本人两次被廷杖,被流放到蛮荒的不毛之地永昌卫(今云南保山),直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他终老云南。后半生近30年,可以说,杨升庵是“云南人”。

关于明代人物的文学及影视作品很热,但作为“大明文宗”的杨升庵却一直冷门。我想,大约是因为有关他的史料记载太少,写起来难度很大。这部《青山夕阳:大明文宗杨升庵》并非人物传记,而是基于极为有限的文献资料,在一个极具创新意义的架构之下,延展发挥创作而成的长篇历史小说。

相信读者们最先留意到的,便是结构。小说由甲编(他们说)、乙编(杨慎曰)、附编(作平记)三部分组成,以三类视角来铺陈关于杨升庵的故事。其中,甲编(他们说)分量最重,占了30多万字篇幅的约3/4。这部分,又分别由七个人讲述,依次为太太监王有根、滇中书生人柳麻子、杨升庵夫人黄峨、嘉靖皇帝、杨府管家杨敬修、内阁首辅杨廷和(即杨父)以及土匪头子丁黑牛。

七人身份迥异,与杨升庵的关系也迥然不同,以此顺序登场,感觉有些混乱?其实不然,比如,太监王有根率先“登场”,是因为他奉旨行刑时“放水”,才让杨升庵得以保命。廷杖的场景作为整部小说开篇,不但极为生动、紧张,更是抛出了一个关于杨升庵及家族命运最大的悬念,让人不由立即就会去猜想:杨升庵究竟犯下何等大逆不道之罪,让嘉靖皇帝如此忌恨,非要在朝堂之上当众让他皮开肉绽?

这部分,小说以实权太监之口,对廷杖这一皇帝威慑和惩治朝臣的手段进行讲解,更是道出了大明官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明规则、潜规则。接着,聂作平自然不会直奔已成功营造起来的悬念的答案。第二位讲述者是永昌地区(即今保山)的说书人,因为,在高中秋元保山名满天下却又遭受“屈辱之刑”后,杨升庵成为了明朝最大的“传

娜嬛颀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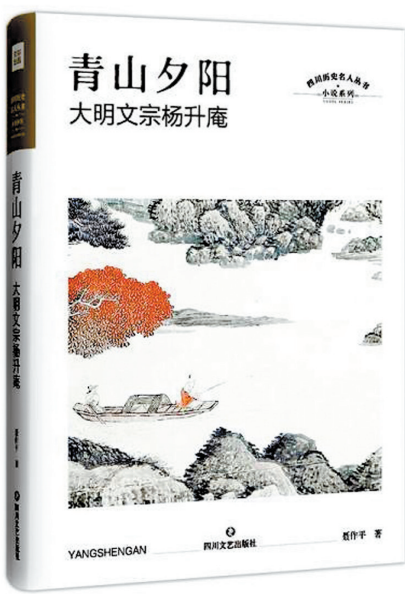


王清任

王清任(1768—1831年),字勋臣,清代直隶玉田(今属河北)人。我国历史上首倡中医人体解剖学的先驱、中医药创新的医学实践家。他曾亲自寻找尸体精心观察人体构造,并绘图补气。通过临床经验,他还创制了很多补剂的、活血化瘀方,写作了《医林改错》一书。

王清任自幼习武,曾考上武举人,后出资捐得干总。因为他的性情耿介,在他任职期间亲眼目睹和经历了晚清官场腐败,他认为自己已有一身武艺却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出于“不当宰相,愿为良医”的愿望,毅然投身医学行业。王清任又因为家乡百姓主持正义而得罪了当地的豪强巨绅,不得不远离家乡,到外地行医。后来,他在北京开了一家“知一堂”药店,并逐渐成为名誉京城的一代名医。

王清任在20岁时就已阅读了大量古医书,但他在阅读和实践过程中,对古书中一些记载产生怀疑。在中国古代,由于封建“孝道”观,人死后是不能解剖尸体的,因此,医学界中没有类似现在的人体解剖学。当时中医对人体结构的描述相当奇怪。王清任在救死扶伤的行医实践过程中,深切感受到解剖学知识的重要性。通过研究古医



《青山夕阳》封面

说”,进入了许多民间艺人的作品中。

然后,则是杨夫人闪亮登场。这是一位能与杨升庵心灵相通的才女,他们的婚姻生活平淡而又多舛,甜蜜而又忧伤。杨升庵的满腹柔情和一些爱欲小心思,得以呈现。虽已带残疾且始终在贬谪困苦之中,但他还是娶了两房妾,都是在今天的昆明安宁。安宁,给了杨升庵平生中难得的一段安宁时光,这方面,小说中是可以有更多表现的。安宁市至今仍奉为其第一城市形象标签的“天下第一汤”,据传,便是杨升庵在一次愜意泡汤后所题。

铺垫至此,终于轮到嘉靖皇帝。“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极权统治制度,“伴君如伴虎”的臣下谄谀境遇,在嘉靖的喜悦无常中逐渐展开,杨氏父子失宠乃至蒙难根源也清晰了起来。

原来,以兄弟及的方式登上皇位的嘉靖,按祖制和礼法,应当追认死去的皇帝(其伯父)为父亲,而改称其生父为叔父。嘉靖坚决反对,面对坚持“大礼”并带领群臣直谏的杨氏父子,嘉靖怒不可遏。其实,嘉靖之所以能登大宝,杨升庵之父杨廷和功不可没。但君王秉性,怎可能念你旧情?

七位讲述者,其思维方式和视角皆存在极大差异,这也就使得他们所讲述的杨升庵呈现出了多张面孔、多种姿态、多样人生。但,这每一个不为其他人所知的“B面”,显然都仅仅只是一个向度上的杨升庵。七者拼合起来,是否就能成为一个血肉丰满的杨升庵?

聂作平显然不满足于此。于是,他在“分饰”七种角色、以七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讲述后,又将笔触直接探入了“本尊”杨升庵内心,这便是第二部分乙编(杨慎曰)。这部分,篇幅仅占全书1/5。

到正式登场之前,杨升庵的形象已然非常非常丰满,但颠沛人生的心

首倡解剖纠医误

——王清任写作《医林改错》

郑千山

书上对于人体结构的记载,他发现有许多矛盾,“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他认为古医书“著书不明脏腑,岂非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盲人夜行?”从此,他开始研究起了人体解剖学。

但王清任没有机会解剖尸体,直到30岁时,他有一次在河北稻地镇行医,正赶上当地瘟疫大流行,这种瘟疫对小孩感染很厉害,每天有上百小儿染瘟疫而亡,当地贫苦老百姓买不起棺材,就把自家病死的孩子裹着破席子埋葬。那时候,当地迷信一种习惯,即不能深埋尸体,必须浅埋,然后让老鹰吃干净,他们认为这样才能给死人的灵魂带来好运气。王清任行医途中恰好路过一家人埋葬的小儿被狗拖咬出来,内脏外露。当地人看见这样的情形都远远躲开,怕不吉利。而他却不嫌臭秽,连续10多天一大早就去观看那小儿的尸体……就这样,他先后观察了30多具。经过反复对比研究,他发现所看到的人体脏腑结构与古书描绘的脏腑图形多有不符之处。又因为这些尸体都是被遗弃在野外的,内脏大多数不完整,所以他曾尝试用各种方法来研究。后来,他听说一个年轻女子被处

罚肢解,想去看一下,却因为中国古代的封建意识,让他最后放弃了这个机会。又过了一段时间,叛贼张格尔被施以极刑,王清任又打算去观察,但因为律法不能靠近。他没办法,只得委托朋友帮忙,总算得以观察。又过了很长时间,他从曾在喀什噶尔领兵作战对人体颇为熟悉的将军恒敬口中得知了五脏六腑和膈膜的形状与位置。苍天不负有心人,经过42年的研究,王清任终于绘出了人体脏腑全图,这就是《亲见改正脏腑图》。在这期间,他为了弄清楚胸膈膜的位置结构,还亲自做了一

路历程,非夫子自道不可也。这里,植入了一条动人的感情线。杨升庵遭遇土匪,被苗族少女阿妮救入苗寨,彼此情愫暗生。但这段在小说而非传记里原本可以展开渲染的线索,处理得非常克制,让杨升庵在弥留之际仍抱憾。这种克制的处理方式,我认为,是与杨升庵的性格相契合的,也兼而体现了聂作平严肃的创作态度。

对于打击报复、并放过许多特赦机会始终不愿意看自己的皇帝老儿,在贬谪的前半段岁月中,杨升庵一直心存希望,幻想着总有起复的那一天。在主角第一人称讲述的这部分,杨升庵的天真与率性、坚持真“礼”的迂腐与愚忠,也都得到了生动的表现。

所有篇幅中,都不时穿插着杨升庵各个人生阶段及各种心境遭受之下所创作的相关诗、词、文,其冠绝大明近300年的文学造诣,在小说故事的推进和大明体制的剖析之中,不断闪现,绽放着耀眼的光芒。

当然,人最难做到的事情就是正确认识自己,此理古今皆然。从这个角度来说,杨升庵所讲述的自己,其实,极可能也只是历史真相中的一个侧面,仅此而已。我依然很乐意用聂作平代表作之一《历史的B面》所“发明”的“B面”这个概念,来看待这样一副形象的杨升庵。这些B面,其实都是大历史中的一些伤痕与“疼痛”,共同构成了某个真实的人物,也共同构成了某段真实的历史。

若整部作品就此戛然而止,无疑,已经是一部非常独特而又优秀的长篇历史小说。但别忘了,作品还有最后一部分:附编,即《作平记》。一定会有人不以为然:不就是一个后记吗?

聂作平追忆与杨升庵的奇妙缘分,其源头,与绝大多数人别无二致,都是他那首被置于《三国演义》卷首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后来,他结识杨升庵研究者郑先生,并在云南保山寻访到了杨升庵后人。这段缘分,渐渐演变成了一丝“奇幻”的成分——当年,苗族少女阿妮亲手雕刻、并赠予杨升庵的那支充满情殇意味的水鱼,隔着近500年的历史沧桑,竟到了他的手里,而且,冥冥中,似乎一直等的就是他。

显然,附编虽具有一定后记的意思,但究其本质,是这部小说有机组成部分。我想说,它更是这部小说非常高明的一个“豹尾”,将作品的时空和精神指向拉到了当下,从而让作品具有了更为厚重和深邃的历史与人文价值。

最后,我想引用聂作平的一句话,来作为本文结尾。聂作平说:“当杨慎远贬滇南,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以文化的力量、文学的力量,既支撑起了自己残破的人生,也为当时落后的云南进行了一次生机勃勃的输血,留下了关于云南的海量著作。”他表示,创作这部作品,其实,就是为了向杨升庵致敬。

些动物解剖,正因如此,他也成为了中国解剖史上第一个做动物解剖实验的医学家。去世前一年,王清任将《亲见改正脏腑图》、自己的治病临床心得及相关医学论述最终写成了《医林改错》一书,实现了自己最初的人生抱负。

《医林改错》算得上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医书,全书3万余字,有25副图谱。书中记载的都是王清任几十年对尸体的观察和解剖而所作出的结论,除纠正古医书对脏腑解剖和人生理功能上的一些错误外,还纠正了前人对于肝的错误理解,并第一次发现了肺主动脉、上腔静脉、颈总动脉、肾动脉等。王清任在书中还表述了50余种病症的临床医学理论认识和诊治经验,结合不同病症的病因、病机特点,他还创制了一批活血化瘀方剂。《医林改错》极大地丰富了祖国医学解剖理论,总结了活血化瘀法的临床实践,有些原理今天仍为临床医生所应用。

由于王清任所处的时代环境和时代局限,王清任所著的《医林改错》,包括他观察到的人体器官的解剖和记录以及解剖观,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依然有不少地方需要“改错”。不过,客观地讲,王清任仍不啻为我国医学史上的一位有胆有识、具有革故鼎新思想的杰出医学家。他除了继承传统,也敢于修正批评传统,并创造性地发展了他,他开辟了中医人体解剖学的先河,对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他在《血瘀论》中针对“血瘀”提出的活血化瘀治法,经过实践检验已形成了独特的医学体系——活血化瘀派。梁启超曾经评论说:“王勋臣……诚中国医界界大胆革命论者,其人之学术,亦饶有科学的精神”,实践出真知,王清任这种科学精神,直到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